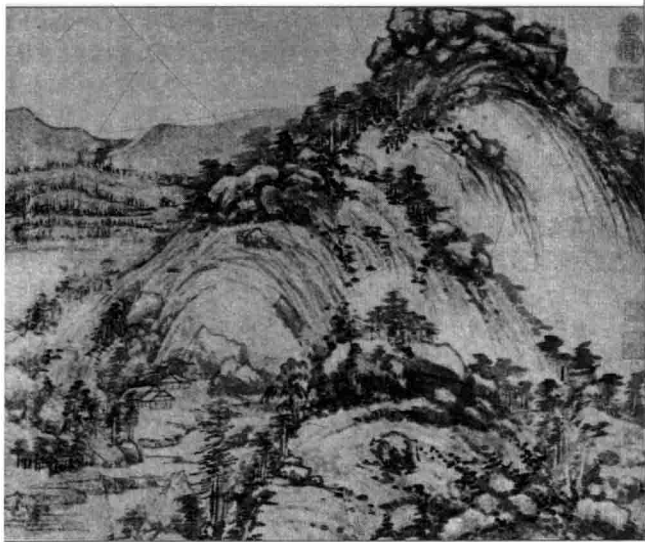


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史研究所论著

岭南历史名人研究

刘圣宜 主编



● 张九龄
● 海瑞
● 袁崇焕
● 屈大均
● 伍崇曜
● 康有为
● 刘士骥
● 梁庆桂
● 梁启超
● 陈济棠
● 张发奎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序

蔡鸿生

有人说，历史教科书往往是乏味的。听起来似乎逆耳，其实是一句忠言，切莫等闲视之。究竟缺些什么呢？也许可以猜测为下面的三“乏”：有人名而无人物，有时间而无节奏，有地点而无场景。既然时、地、人已弄成三条鸡肋，任何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都被符号化，寻味就无从谈起了。

在时、地、人的三位一体中，人是一个被制约的主体。正像如来掌心的孙大圣，它可以飞扬，却无从超越。难怪黑格尔在《哲学史导言》中早就断言：“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，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。”因此，尘世中人，其生平无非是时代的零件，必须通过历史撰述的整合来起死人而活白骨，历史人物才成其为在历史上生存的人物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可以说任何“传”都应当向“史”回归。

精心结集的《岭南历史名人研究》，共收论文12篇。它不是乡土性的先贤传，更不是历史教科书，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。其中有士，有商，有将，有相。他们的出身、教养和功业，可说是五花八门的。尽管各自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代，但都属于中华文化系谱繁衍出来的岭南产儿。这批岭南人的生平，或存古风，或染洋气，或兼而有之，均被合理地视作那个时代历史的一部分。这样，个体的传与总体的史相结合，树木就与森林连

成一片，更加有“味”可寻了。

文集的各位作者，都是致力于文史研究的专家。在历史观、史料学和方法论方面，学养深厚，持论平正。故能对复杂的历史现象，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。正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所说：“传中叙事，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，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，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，而称量出之。”所谓“称量”就是分寸感。我认为，这本文集对涉及的历史人物，凡所评议，都能力求做到“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”。真味来自实学，与放言高论是大异其趣的。

古人是今人的一面镜子。历史人物的评价，为知人论世拓展了认识空间，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。没有历史眼光，就不能照射现实的深处。可惜若干年来，“历史无用论”的幽灵时隐时现，给人留下不少困惑。要辨惑是艰难的，我们只能平心静气地说：
△ 历史知识确实没有任何实用价值。这种超实用性，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如此而已，岂有他哉。

2001年12月，写于中山大学

目 录

序	蔡鸿生 (1)
张九龄的政治思想	马茂军 (1)
不怕死, 不爱钱, 不立党	
——海瑞人格的历史反思	陈宪猷 (18)
海瑞和陈瑛廉政事迹述评	高惠冰 (41)
《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》历史人物考述	颜广文 (64)
屈大均在肇庆的游历与考察	杨 皓 (91)
伍崇曜的经济与文化活动的述略	谭赤子 (108)
论康有为的海外诗	常 云 谢飘云 (127)
刘士骥与振华公司血案	赵立人 (177)
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	刘圣宜 (225)
论 1899—1903 年间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发展	
.....	宋德华 (248)
论陈济棠与德国的军事关系	肖自力 刘义章 (274)
张发奎与北伐战争研究	左双文 (308)
后记	(332)

张九龄的政治思想

马茂军

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前人已有论述，现就不为人注意的几点略加阐述。

一、张九龄的礼治思想

张九龄的礼治思想首先受当时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。历代开国王朝都将制礼作乐作为一件大事来抓，史书将礼仪放在志的第一，可见礼仪在一代之治中的地位。《旧唐书》礼仪一“《记》曰：‘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’欲无限极祸乱生焉。圣人惧其邪放，于是作乐以和其性，制礼以检其情，俾俯仰有容，周旋中矩。……五帝之时，斯为治本。……故曰，修五礼五玉，尧舜之事也。时代犹淳，节文尚简。及周公相成王，制五礼六乐，各有典司，其仪大备……仲尼之世，礼教已亡。”汉代叔孙通定仪，经晋隋儒士的恢复，“仅有遗风”。唐贞观显庆两次大规模修礼，大兴礼仪之治成为初唐的一种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。大批的儒士和文士参加了这个运动。

太宗皇帝践祚之初，悉兴文教，乃诏中书令房玄龄、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，修改旧礼，定著吉礼六十一篇，宾礼四篇，军礼二十篇，嘉礼四十二篇，凶礼六篇，国恤五篇，

总一百三十八篇，分为一百卷。（贞观礼）

高宗初，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，又诏太尉长孙无忌……等重加缉定，勒成一百三十卷。至显庆三年奏上之。（显庆礼）

开元十年，诏国子司业韦缙为礼仪使，专掌五礼。（掌修礼之事）……历年不就。说卒后，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，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，名曰大唐开元礼。（开元礼）

张九龄作为一名“弱岁读经史，抗迹追古人”（《叙怀》）的儒者，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，也自然地成为一名礼仪学者。

除了父母，最早对张九龄产生影响的人应该是王方庆。《旧唐书》本传云：“年十三，以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，大嗟赏之，曰：‘此子必能致远’”。致远当是指为人有礼有节，心境淡远，不像初唐文人急功近利。《旧唐书》本传云：“方庆博学好著述，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。尤精三礼，好事者多询访之。每所酬答，咸有典据，故世人编次，名曰《礼杂答问》。聚书甚多，不减秘阁，至于图画，亦多异本。”方庆嗟赏之余，定教导读书做人的方法，指导学术路径，后来礼学成为张九龄治学的重点，也长期从事礼学相关的工作。

第二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张九龄的政治靠山张说。

张说在开元礼治中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大唐开元礼张说是实际的主持人。玄宗即位，开元十一年十一月，“亲享圆丘。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，……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，始罢三祖同配之礼。”^①“说又首建封禅之议。十三年，受诏与右散骑常侍徐坚、太堂少卿韦缙等撰东封仪注。旧仪不便者，说多所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二十一礼仪一。

裁正，语在礼志。玄宗寻召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。”^①

十四年，通事舍人王岩上书请改撰礼记，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。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。右丞相张说奏曰：“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。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。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，其中或未折衷。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，删改行用。”制从之。^②

九龄的朋友赵冬曦也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。“考功员外郎赵冬曦、太学博士侯行果曰：‘先焚者本以降神，行之已久。若从祭义后焚为定。’中书令张说执奏曰……”^③

时帝未行亲郊之礼，九龄上疏曰：

伏以天者，百神之君，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。自古继统之主，必有郊配之义，盖以敬天命以报所受。故于郊之义，则不以德泽未洽，年谷不登，凡事之故而阙其礼。孝经云：“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”斯谓成王幼冲，周公居摄，犹用其礼，明不暂废。汉丞相匡衡亦云：“帝王之事，莫重乎郊祀。”董仲舒又云：“不郊而祭山川，失祭之序。逆于礼正，故春秋非之。”臣愚以为匡衡、仲舒，古之知礼者，皆谓郊之为祭所宜先也。伏惟陛下绍休圣绪，其命惟新，御极已来，于今五载，既光太平之业，未行大报之礼，窃考经传，义或未通。今百谷嘉生，鸟兽咸若，夷狄内附，兵革用宁。将欲铸剑为农，泥金封禅，用彰功德之美，允答神祇之心。能事毕行，光耀帝载。况郊祀常典，犹阙其仪，有若怠于事天，臣恐不可以训。伏望以迎日之至，展焚柴之礼，升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七张说传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二十一礼仪一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二十三礼仪三。

紫坛，陈采席，定天位，明天道，则圣朝典则，可谓无遗矣。^①

此文作于开元四年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：（1）九龄很早就关注礼仪之事了。此文在开元礼制定之前。（2）九龄对礼学很有研究，对礼学掌故可以熟练地运用。（3）九龄的礼学是和君权神授的天道观结合起来的。（4）他的礼学思想又是和百姓安乐、边疆安宁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的。

由于以上的原因，九龄后来的政治生涯和礼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。

大概由于以上奏议，开元七年为礼部员外郎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三“礼部”：

郎中一员，员外郎一员，主事二人，令史五人，书令史十一人，亭长六人，掌固八人。郎中、员外郎之职，掌贰尚书、侍郎。举其仪制而辨其名数。凡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：一曰吉礼，其仪五十有五；二曰宾礼，其仪有六；三曰军礼，其仪二十有三；四曰嘉礼，其仪五十；五曰凶礼，其仪一十有八。凡元日……大会之日……凡乐有五声、八音、六律六吕，陈四悬之度，分二舞之节，以和人伦，以调节气，以享鬼神，以序宾客。……

开元七年，张九龄有驳宋庆礼谥议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云：“七年卒，赠工部尚书。太常博士张星议曰……案谥法：好巧自是曰专，请谥曰专；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曰庆礼在人苦节，为国劳臣，一行边陲三十年所。户庭可乐，彼独安于传递；稼穡为艰，又能实于军廩，莫不服劳辱之事而匪懈其心；守贞坚之规而自尽其力……乃谥曰敬”。

开元十二年为中书舍人后，多次参加了祭祀大典，和礼学关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九张九龄传。

系转为深厚。

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护驾登泰山封禅；谏张说推恩不及百官；转太常少卿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四职官三“太常寺”：

卿一员，少卿二人。太常卿之职，掌邦国礼乐、郊庙、社稷之事，以八署分而理之。……少卿为之贰。凡国有大礼，则赞相礼仪。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。率太乐官属，宿设乐悬，以供其事。宴会，亦如之。若三公行园陵，则为之副，公服乘辂备卤簿而奉其礼。若大祭祀，则先省牲器。凡太卜占国之大事及祭祀卜日，皆往莅之于太庙南门之外。凡仲春荐冰及四时品物甘滋新成者，皆荐焉。凡有事于宗庙，少卿帅太祝、斋郎入荐香灯，整拂神幄，出入神主。将享则与良酝令实樽罍。凡备大享之器服，有四院。

开元十四年正月，有敕命祭南岳南海。《唐大诏令》卷七十四命卢从愿等祭岳读文：“宜令……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。”

开元十五年有《祭洪州城隍文》。

开元十八年有《祭舜庙文》。

开元二十年有《后土赦文》。

二、张九龄的吏治思想

张九龄的政治思想体现了有为与无为的统一，既是君主的无为与吏的有为的统一，又是发展经济与无为而治的统一。张九龄早期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《上封事书》中。后来张九龄将为政概括为四端八要，在《敕处分十道朝集使》中分析说：“凡今政要，略有四端，衣食本于农桑，礼义兴于学校，流亡出于不足，争讼出于无耻。故先王务其三时将以厚生也，修其五教以淳俗也。”八事则是“且浮逃客户，所在安辑；征镇人家，每事忧恤；

仓储唯实；赋役唯均；鰥寡抚存；盗贼禁止；邮驿无弊；奸讹不生，念兹八事，朕常屡想。”

张九龄的思想以仁政为主，但并不如李林甫所说“拘于古礼，不知大义”，他首先强调衣食农桑，然后强调学校礼仪。在张九龄的政治理想中有一强烈的，远古的，风俗淳厚的理想世界：“浇俗不可不革，淳风不可不返。”而这种王道仁政又是和循吏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“县得良宰，万户息肩；州有贤牧，千里解带；仁政不遥，行之则是；皆能厉节，朕复何有。”^①

“且一郡之政，系一己之能，泉源既清，蓬麻自直，为长吏者，可不勉之。”^②张九龄认为老百姓是愚昧无知的，循吏应该以仁恕之心行使仁政：“相其物土之宜，务以耕桑之本，时无妨夺，吏不侵渔，既富而教，奚畏不理？至若征镇役重，孤弱命穷，将须哀矜，以遂仁恕。”^③

吏治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，他把它看作是王道仁政理想的实现手段，这也是他比一般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高明的地方，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吏治的混乱，尤其是县令的不得人，他在《上封事书》中深为忧患地写道：

今六合之闲，元元之众，莫不悬命于县令，宅生于刺史，陛下所与共理，此尤亲于人者也，多非其任，徒有其名，致旱之由，岂唯孝妇一事而已。是以亲人之任，宜得其贤，用才之道，宜重其选。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，雄望之州，刺史犹择其人，县令或备员而已。其余江淮陇蜀三河诸处，除大府之外，稍稍非才，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，或是缘身有累，在职无声，用于牧宰之闲，以为斥逐之地；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九张九龄传。

② 同上。

③ 《敕处分十道朝集使》。

或因势附会，遂添高班，比其势衰，且无他贵，又谓之不称京职，也乃出为刺史；至于武夫流外，积资而得官，成于经久，不计于有才，诸若此流，尽为刺史。其余县令以下，固不可胜言。盖氓庶所系，国揭之本务，本务之职，反为好进者所轻，承弊之人，每遭非才者所扰。陛下圣化从此不宜，皆由不重亲人之选，以成其弊，而欲天下和洽，固不可得也。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，莫不於其所重，劝其所行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。

张九龄充分认识到作为帝国的基层组织，王权的基础——县令的重要作用，而现状是那么令人忧虑，职位皆由非才无声者，滥竽充数者填充，百姓无以为望，国家无以为治，王化无以为施。联想到安史之乱，唐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，望风披靡的惨状，你不得不佩服张九龄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政治敏感。

他在《敕处分十道朝集使》第二道中，指出当时吏治的八大问题：“且外台者，长吏主之，至如礼义不兴，耕桑不劝，孤寡不恤，徭役不均，不肃吏从，不清盗贼，不惩侵暴，不纠奸讹，有一于此，是谁之过？”

在他心目中，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模式，皇帝乃天子，必须修圣德，有德者居之；宰相代天理物，必须辅德之成，这属于无为的层次；天子将天下分为若干州县，太守和县令属于具体的政策执行者，负责处理日常琐事，是有为的阶层，一切王道、仁政都依靠他们来施行，他们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成败。

天子和州县之间还应该有关吏一级的联络和监督员——十道朝集使，这实际上是对汉代政治的学习和复古，他是一个复古的人，而汉代和周代是他的复古理想，他的大部分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来源于此。这一点上他和李林甫杨国忠这一帮没有政治理想的人是不同的。

三、张九龄的选举思想

政治和选举是密切相关的。吏治的混乱与不力是由于人才的缺乏，人才的缺乏必然让人想到选举，隋唐科举制度无疑是一大发明创造。李世民曾高兴地说“天下英雄入我彀中”。但万事都有个正负效应，张九龄在《上封事书》中敏锐地指出科举制度的缺陷说：

又古之选用贤良，取其称职，或遥闻而辟召，或一见而任之，是以士修素行，不图侥幸，群小不逮，也用息心。以故奸伪自止，流品不杂，……只益文法烦琐，贤愚混杂，就中以一诗一判，定其是非，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，斯也明代之缺政，有识者之所叹息也。

他所说的贤良、辟召也是要复辟汉代的制度。高帝十一年诏曰“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”汉廷每诏举“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”之士，简称贤良。他所讲的“士修素行”就是指汉代的孝廉，孝廉为孝子廉吏的简称，至东汉初，茂才、孝廉定为岁举，光武建武十二年，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，廉吏各二人。贤良孝廉之举，一方面为国家选举了人才，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鼓舞风气，奖励风俗的作用。此风一开，社会趋之若鹜，虽郡县小吏也皆文质彬彬，风俗日淳。

随着人才日众，荐举制又和考试结合起来。顺帝阳嘉元年，初令郡国举孝廉，“限年四十以上，诸生通章句，文吏能笺奏，乃得应选，其有茂才异能，不拘年齿。”

我们谈及古代，必曰汉唐盛世。汉代荐举制度确有其高明精巧之处，对于入仕之初的张九龄而言，汉代之制无疑会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，他以一个科举仕子的身份来批判科举制度，无疑是有着切身的感受。科举制度作为一个万民歌颂的新生事物，

无疑有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。而张九龄一眼即看出它的弊端，足见他非凡的政治敏锐和洞察力。

不过任何合理的事物在他产生之时即已埋下了不合理的种子。荐举制在汉代已暴露了种种弊端，当时即有反对者如黄琼、胡广、张衡、崔瑗等人。而请托舞弊，滥竽充数者也不在少数，如章帝元年诏：“刺史守相，不明真伪，茂材孝廉，岁以百数”，“率非功次”。

他在上姚崇书中即提出荐举一事，姚崇委婉地指出不切实际，他指出选择十道朝集使尚且不尽如人意，何况全国上百州县。这应该也是当时一般政治家的看法。

有意思的是当他执政为宰相时，他也并未坚定地推行荐举制。而他的政治命运也因他荐举的周子谅而被贬荆州。这也许是一个宿命。

不过他在人才的培养和荐拔上确实有过人之处。“九龄以才鉴见推，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，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，前后数四，每称平允。”^①

他在《上封事书》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思想：

首先是重视基层工作经验，“故臣愚以为欲理之本，莫若重刺史县令，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，正宜悬以科条，定其资历，凡不历都督刺史，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，不历县令，有善政者也不得入为台郎给舍郎。”他认为京官外官应该轮换，“不得十年频任京职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”。

其次是打破排资论辈，主张选贤任能。“又古之选用贤良，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，或一见而任之”，今“唯据其合与不合，不论贤与不肖，大略如此，岂不谬哉！”“据资配职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，初无此意，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，官曹无得贤之实，朱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九张九龄传。

紫同色，清浊不分。”

“辟召”是指汉代与察举制并行的征辟制。选举多循资格，辟召则多以高才重名而超卓任用。故汉代公卿尤以辟士为高。如樊英被征初至，“朝廷设坛席，待若神明”。郑康成被征为大司农，供给安车一乘，所过长吏迎送。董卓征荀爽，初拜平原相，途中又拜光禄勋，视事三日，拜司空。

他的任用贤能思想，反映了他的精英政治的理想，文弱的张九龄实有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之让天下大治的宏愿。所以打破排资论辈，超次用人是他为相的一项重要政策。

在选举中，他提出了定流品的思想，这源于汉魏的九品中正制。

在他的人才流品中，李林甫属于奸诈之徒；牛仙客属于吏流，不入士流；张守珪属于武夫之流；安禄山则属于叛流。“九龄奏曰：‘禄山狼子野心，面有逆相，臣请因罪戮之，以绝后患’”^①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：“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，问于中书令张九龄。九龄对曰：‘宰相系国安危，陛下相林甫，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。’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：“朔方节度使牛仙客，前在河西，能节用度……上闻而嘉之，欲加尚书，张九龄曰：‘不可，尚书古之纳言，唐兴以来唯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。仙客本河湟使典，今骤居清要，恐羞朝廷。’”

定流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选拔官吏，是为了士子培养自己的修行、节操，是为了养士之德，培育一代士风：

“九品流弊，昔所慵焉，幸应对扬，庶言其可，古者诸侯贡士，司徒论士，必讲礼观能，乡举里选，十五十八之岁，大学小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九张九龄传。

学之节，诵习以时，教化以礼，则孝悌之行可知于乡曲，政事之业可升于国朝。先王务教，此其大者，及周道既衰，斯文将丧，秦氏灭学，唯力是亲，仁义大坏，俊造也亡，汉高以马上非礼，复修三代之事，魏武也军中是务，权立九品之仪。后代因循莫能改作，纷纷横调，滔滔皆是。……且将振九品之颓网，维百王之绝略……。”^①

作为岭南的代言人，他的荐举思想实际上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：作为大一统的政府，全国各郡县应该平等参加中央政局，分享平均的政治权利，汉代的荐举制实行定额定员制，和帝时，大郡口 50 万 - 60 万人举孝廉 2 人，小郡口 20 万人并有蛮夷者也举 2 人，可见对少数民族的优待。丁鸿、刘方上言“郡国率 20 万口岁举孝廉 1 人，40 万人 2 人，上至 120 万 6 人，不满 20 万，2 岁 1 人，不满 10 万，3 岁 1 人。”

唐代实行的南选基本上反映了岭南人的这一愿望。但是唐初的“承制选补”受益者基本上是地方豪族，一般士子很难收益。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载武德四年，李靖率唐军进入岭南，派人分道招抚，豪族大首领冯盎、李光度等皆遣子孙来谒，“靖承制授其官爵”，得郡 96，户 60 万。高宗时期的南选对这种情况有所改善，《唐六典》卷二：“其岭南、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，曰南选。”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云唐高宗上元二年以“岭南五管、黔中都督府即任士人，而官或非其才，乃遣郎官、御史为选补使，谓之南选。”高宗时的南选虽然使一般士子得到了较好的利益，但南选只选拔下层官员，张九龄的目标是进入中央政府，二者之间还是有极大差异的。

张九龄早年为自己生在蛮荒不能进入权力中心而不平，他在《浈阳峡》中托物咏志写道：“惜此生遐远，谁知造化心”。即使

^① 《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一道》。

进入了中央政府后他也有一种深刻的孤寒感觉。《咏怀二首》“孤根也何赖，感激此为邻”。在《海燕》诗中，诗人以来自远方南海孤独的燕子自比：“海燕何微眇，乘春亦暂来，岂知泥渣贱，只见玉堂开。……无心与物竞，鹰隼莫相猜。”在《荆州作二首》中诗人自比为孤独的树、受伤的鸟：“胡为复惕息，心伤不林树。伤鸟畏虚弹，自念独飞翰。”《孤桐》诗中则以孤桐自比：“孤根自靡托，量力况不任。多谢周身防，常恐横议侵。”

四、张九龄的黄老思想

张九龄政治上推崇黄老无为而治，其个人的理想人格原型是汲黯。汲黯，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，司马迁《史记》载：“黯学黄老之言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静，择丞史而任之，其治，责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”^①

九龄体弱多病，似汲黯，在太守任上，也多主张清静简净，不扰于民。他任宰相后对前任姚、宋、张说颇有萧规曹随之意，他与曹参确有相似的历史背景与环境，只是命运和结局不同而已。曹参的思想来源于“善治黄老言”的盖公，“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，推此类具言之”。^②曹参为相，无所事事，只在家喝酒，惠帝很疑问，他便说：“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。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^③曹参作了三年丞相，老百姓歌颂他说“萧何为法，颡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”^④

① 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

② 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九龄为相，重礼乐，继续推行十道朝集使制度，大多守前代之成，年轻时《上封事书》的激进态度有所改变，可惜其道不终。如果能够继续抑武功，守清静，则骄兵悍将可抑也，安史之乱可免也，盛唐大业可继也。

军事上、外交上反对好大喜功、穷兵黩武，这与玄宗的意见相左，也是张九龄罢相的原因之一。

黄老思想亦表现为人生的消极无为、退让，以及贯穿一生的归隐思想。他在《登乐游原春望书怀》写道：“奋翼笼中鸟，归心海上鸥。……愿言从所好，初服返林丘。”他也曾经真的辞官归隐，“去去荣归养，抚然叹行役”。开元十二年作的《奉和圣制经河上公庙》明确表达了诗人政治上的黄老思想：“昔者河边叟，谁知隐与仙。……从兹化天下，清静复何先。”以清静无为为最好的治国方法。开元十五年左右诗人洪州都督任上，比较充分地实践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，《登楼望西山》“檐际千峰远，云中一鸟闲。……勿复尘埃事，归来且闭关。”《晨出郡舍林下》“晨兴步北林，萧散一开襟。复见林上月，娟娟犹未沉。片云自孤远，丛竹亦清深。无事由来贵，方知物外心。”此诗他的朋友司马崔颂有和诗，和诗更歌颂了当时政清人和的情况：“优闲表政清，林薄赏秋成。江上悬晓月，往来亏复盈。天云抗直意，郡阁晦高名。坐啸应无欲，宁辜济物情”。

诗人一再表达的闭关、病卧、清静、悠闲，其原型是汲黯，《史记·汲黯传》：“黯多病，卧闺阁内不出。岁余东海大治。”张九龄《洪州西山祈雨，是日辄应，因赋诗言志》“闭阁且无责”《郡内闲斋》“郡阁昼常掩，庭芜日复滋。……拙病宦情少，羈闲秋气悲。理人无异绩，为郡但经时。惟有江湖意，沉冥空在兹。”张九龄的闭阁卧病，既是为无为而治，又是退隐。《郡舍南有园畴杂树，聊以永日》“为郡久无补，越乡空复深。苟能秉素节，安用叨华簪。却步园畴里，追吾野逸心。”